

# 日本的传统文化及其特点

## 界定日本传统文化

日本的传统文化及其与日本现代化的关系问题，是近年来我国日本学术界颇为重视的研究领域。不少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研究。例如，日本国民性、民族性问题的研究；日本文化与外来文化关系问题的研究；日本儒家文化问题的研究；日本传统家族制度与“家意识”问题的研究；日本集团主义问题的研究，等等。上述研究对日本传统文化研究的深入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在大量使用日本传统文化概念的同时，却往往

未明确说明，究竟什么是日本的传统文化，对它的研究究竟应探讨哪些问题。为此，有必要对将要探讨的日本传统文化作一个大致的界定。

日本文化是日本民族在特定的自然、社会环境中的创造性活动及其产物的总和，日本的传统文化则是其历史文化的积淀物。人们在研究文化时，把文化分为不同的层面或系统，这种划分对传统文化同样也是适用的。日本传统文化的构成纷繁复杂，内容丰富多样，表现在各个方面。将日本传统文化作进一步的分类，不仅有助于观察这些文化现象，而且有利于对各种传统文化对现代日本文化的作用和影响作出正确的评价。本书试将日本传统文化研究中应探讨的内容分为以下几个层次：物态文化层，即以物质文化的形态表现出的传统的生产及生活的方式；制度文化层，表现在制度上的传统的道德和法律的规范；行为文化层，即传统的礼俗、习俗、风俗和民俗；精神文化层，表现在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心理方面的传统文化，如传统的哲学、宗教、艺术、价值观、社会心理、民族性格等。

日本传统文化是指日本文化中被一代一代继承下来的事物，是日本历史文化的积淀物，因此在研究日本传统文化时，应首先弄清那些相对现代日本社会而言的传统文化在历史上是怎样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日本的传统文化并不只是日本的原初文化，即并不是后人将原初文化作为传统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的那一部分，而是日本文化发展的各个时期不断地复制和再创造出来而存在于传统社会的广义文化，它既有原初文化中的成分，亦有不断被吸收、消化而日本化的外来文化成分，更有随传统社会发展而产生的各时期的新文化成分。这样看来，从两个方面进行对日本传统文化的考察

是必要的。一方面，从纵的方向上，考察历史上各个时代的日本传统文化形成与发展的具体过程；另一方面，从横的方向上，揭示在现代社会到来之前的日本传统社会文化的主要特征，为更加清晰和便于理解与鉴别，我们将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特点进行比较中进行阐述

## 日本原初文化

距今 170 万年前，东亚大陆上已有原始人类生存。远古时代的日本与东亚大陆是有陆路相连的。只是在 1 万年前，海水上涨，日本列岛才与大陆分隔开。

日本最早发现原始人化石，是在 1931 年。当时考古学者在兵库县明石市西八木海岸，发现了一片古人类的左腰骨化石。1945 年后，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古人类化石不断发现。虽然发现的遗骨数量不多，但也显示了原始人类发展的轨迹。1950 年，在栃木县安苏郡的葛生町，考古学者发现了 6 件人类遗骨化石，取名为“葛生猿人”。1957 年，在爱知县丰桥市的牛川町，考古学者发现了人类的遗骨化石，取名为“牛川人”。1959 年，在静冈县的三日市，发现了人类的 7 件遗骨化石。60 年代以后，又相继在静冈县的滨北市，大分县的圣岳洞穴、岩户，冲绳县的港川、宫古岛等地出土了人类的遗骨化石。

据学者研究，明石人遗骨化石是日本发现的古人类遗骨中属于最原始的人骨化石，它所处的层位，处于第二冰河期，与中国的蓝田猿人、北京猿人属于同一地质年代。宫古岛人与中国南方猿人有相似之处。其余的葛生人、圣岳人、牛川人、三日人、滨北人、港川人生存的年代，大约在更新

世中期至晚期之间据遗骨检测数据，其中圣岳人、三日人与中国的山顶洞人在种族形态上均属东亚类群，十分相近。

自 1949 年初夏，日本初次发现旧石器遗存以来，经过 50 年的发掘，旧石器文化遗址已达数千处，遍及日本列岛。日本的旧石器文化可以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大约 10 万年前—3 万年前）的石器文化，以手握工具和指捏工具为主，石器原料来源于自然砾石，经过简单的加工，成为尖器和刮削器等；第二阶段（大约 3 万年前—1.4 万年前），日本的旧石器文化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出现定型石器和研磨技术，装柄石器普及；第三阶段（约 1.4 万年前），日本旧石器文化进入细刃器文化阶段。

不同阶段的旧石器文化，与东亚大陆，特别是与中国的石器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日本早期的旧石器文化，与中国周口店的石器文化有许多近似之处，中期的石器与中国的陕西、河南、山西一带的石器文化相似，而晚期的细刃器文化则属于中国华北的细刃文化圈。

对旧石器时代，日本原始人类的生活状况，我们仍知之不多。原始文化方面，除人类遗骨化石及石器可供推测外，无法具体考察。故论述日本文化起源，尚只能从新石器时代的绳文文化开始。

日本原初文化，主要指绳文时代的文化。亦有学者将后来的弥生文化、古坟文化均作为原初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sup>①</sup>。大约 1 万年前，日本进入新石器时代。这一时代的最大特征，就是人类开始制造和使用陶器。在这一时代的遗址中，出土陶器的外部大多饰以草绳纹，因此被称为绳文（纹）陶

参见魏常海著：《日本文化概论》，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6 页。

器，这一时代也被定名为绳文（纹）文化时代（约 1 万年前—约公元前 3 世纪）。

从考古资料可知，绳文时代的日本社会，以血缘为纽带的母系家庭为基本单位，一个母系家庭大致由 5—10 人组成，若干个同血缘的家庭构成氏族公社。一般情况下，绳文前期，一个氏族公社由六七户同血缘家庭组成，中期或后期，则由 10 户左右的家庭组成一个原始公社的成员大多以弧状或环状构筑竖穴群。弧状或环状的竖穴群中央，辟有召开公社会议、举行集体活动和从事祭祀的场所。

绳文人的生产活动，主要是狩猎、捕捞和采集。与这种活动相适应，生产技术也有明显的提高。生产工具除石器外，尚有陶、木、竹、骨器。狩猎工具弓矢已广泛应用。捕捞用的独木舟及种种渔具的出土，表明绳文人已开始从事深海捕捞，并已使用网捕法。从出土的遗物分析，绳文人的食物种类非常广。他们食用的植物达 300 种以上，鱼类 70 余种，贝类 200 余种，动物 60 余种。

绳文人的生活，随着生产范围的扩大日益改善。首先表现在生活方式逐渐由流动趋向稳定。早期的尖底深钵陶器，在中期以后被平底深钵陶器所替代。原始的织布技术也已出现。装饰品的制作技术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考古发掘中用兽骨、鱼骨、贝壳、玉石、竹木制造的精美饰物有大量发现。绳文人把自然物作为崇拜偶像。他们最崇拜的偶像是女性神。女性神被视为丰产的象征，避邪驱恶的神灵。绳文人还有屈肢葬和拔牙的风俗。

尽管绳文文化对日本传统文化有着深远的多方面的影响，如在语言、风俗、信仰、崇拜等方面均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但日本传统文化还是应在日本农耕社会确立之后开始

形成的。

## 日本传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日本传统文化形成于何时，日本学界众说纷纭，既有最早的绳文时代说，也有最晚的德川幕府时代说，还有其间的弥生时代说、镰仓时代说、室町时代说等等。本书认为，将形成期定得过早，日本传统文化的重要成分及特征均尚未显现；而定得过晚，则可能在日本传统社会中留下长时间的文化空白期。当然，对传统文化概念的界定不同，亦会造成认识的差别。我们依据本书对传统文化概念的界定，认为日本传统文化形成于农耕社会确立和统一国家成立的弥生时代至大化革新时期，传统文化经历其发展阶段后，从镰仓幕府建立起进入了发达成熟阶段

日本的农耕社会确立于弥生时代。

大约在公元前 3 世纪左右，日本从绳文文化时代进入弥生文化时代（约公元前 3 世纪—公元前 1 世纪）这一时代盛行的弥生陶器，形制一致、纹样简单、外形美观。因首先发现于东京都弥生町（在今文京区）而得名。弥生文化具有多元性、传统性、国际性和创造性等特征。它既继承了绳文文化的传统，又广泛地吸取了外来文化，并在外来文化的启迪下，发挥自己的智慧，进行了创造，因而形成了文化的多元性。在形成弥生文化的诸因素中，不可忽略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

弥生时代，稻作农耕获得了迅速发展。考古资料表明，日本的稻作文化是在绳文时代的中晚期由中国大陆传入的稻作文化，首先植根于九州地区。日本东北地区很可能在弥生

时代前期已传入水稻耕作技术。弥生时代的稻作农耕技术有了长足的进步，耕作已从粗耕进入细作。

据现已掌握的考古资料，日本早期铁器的使用，大致有三个发展阶段：绳文时期晚期至弥生时代中期，为铁工具普及阶段；弥生时代中期的后半期至后期的中期，为铁制武器普及阶段；弥生后期的后半期至末期，为铁制农具普及阶段。虽然绳文时代晚期已开始使用铁器，但是其广泛应用则始自弥生时代。据统计，弥生前期有 6 处遗址出土 15 件铁器，52 处中期遗址出土 191 件，而后期的 69 处遗址则出土了 244 件铁器。

进入弥生时代后，由于农业的发展，人类生存所必需的食粮有了基本保证，与农业密切相关的水利的管理，生产工具的制造与管理，以及祭祀活动的管理等权力的扩大，促进了社会的分化，上下贵贱差别日渐明显，开始向阶级社会转化。大约公元前 1 世纪至公元起始年间，在九州北部和畿内等先进地区出现了地域小国家群。

小国之间的力量强弱也是有差距的。经过相互之间的联合与兼并，逐渐趋向于地域的联盟国家。据文献和考古资料，仅九州北部地区，就有奴国、伊都国、吉野里国、末卢国等。这些国家均与中国有密切关系。在奴国（今福冈县福冈市及周边地区）发现了大量的西汉镜和铜剑、铜矛等。尤其是“汉委奴国王”金印的出土，证实了奴国与东汉的册封关系。吉野里国是近年发掘的遗址，表明在大陆先进文化影响下，佐贺平原地区也存在着较强的地域国家。

公元 1 世纪末 2 世纪初，以九州北部、畿内地区和四国岛高知县土佐地区为中心，出现了地域更广、实力更强的地域性国家。《三国志·魏志·倭人传》记载的邪马台国就是

其中之一。关于邪马台国的所在地位置，学术界有不同说法，有人认为当时日本的最先进地区在九州北部，邪马台国应在九州北部；有的认为在畿内地区。近年，有的学者依据文献和考古资料进行综合考察，提出了日本文化发展的多元论。指出自公元 1 世纪末 2 世纪初以后，九州北部和畿内地区分别存在着实力相近的统一的地域国家，这就是九州北部的邪马台国和畿内地区的古大和国。最近，又提出了高知县土佐邪马台国说。

邪马台国的经济基础是农耕。农业的发展，不但为人们提供了食粮，而且为制酒、纺织等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考古发掘证实，如在奈良、大分、福岡、佐贺、长崎等县当时已出现了纺织机具和纺织品。发现的纺织品多数是平织绢。经研究，制绢的蚕丝虽然是日本产的，但蚕种则与中国长江流域的蚕种有渊源关系。与纺织业发展相适应，布和绢织物的染色技术已相当进步。从遗物可知，当时已掌握紫、红、黄、茶、白等色的染色技能。专供上层贵族享用的工艺手工业也已出现。邪马台国第三代王壹与曾向曹魏赠送白珠 50 孔、青大句珠 2 枚，表明装饰制作已十分精细。

邪马台国的冶炼技术尤为发达。仅福岡县已发现的制铁遗址即多达 60 余处。在九州各地出土了大量的铁制武器、工具和农具。铜器制作技术主要表现在铜镜、铜剑、铜矛、铜戈的铸造。在九州北部地区的弥生中后期遗址中，不但发现了大量铜制的武器、用具，还发现了许多模具和冶炼遗迹。1980 年和 1982 年，在佐贺县安永田、福岡市博多区的赤穗浦两遗址中，发现了铜铎的模具，反映了弥生中期以后日本的铜铎生产存在着畿内和九州北部两个生产中心。

在农业和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邪马台国的社会结构也

发生了重大变化。

古大和国位于畿内地区。根据现有的考古资料研究分析，古大和国的基本情况如下。

第一，古大和国的经济基础是以稻作为中心的农业。畿内地区发现的水田遗址表明，耕作技术已相当进步。稻田的构筑有两种类型：一是大田块制，一是小田块制，有的则是大块田中又区分若干小田块。水稻不但在冲积平原地区有种植，而且在丘陵地带的缓倾斜坡上也有种植。滋贺县服部遗址的水田，总面积达 1.87 万平方米。在冈山县的原尾岛遗址，发现了住居和水田遗址。遗址中发现了 28 座竖穴屋址、13 座仓储建筑遗迹、245 个土圪、24 口水井、109 条水沟。这反映了当时农村的基本概貌。根据出土的木制农具和水田的稻株痕迹，可以推测已采用插秧法。第二，冶炼业兴盛。这一地域的铁器，由于酸性土质等因素不易保存，出土数量不及九州北部地区，但据 70 年代末统计，出土量也有 80 余件。冈山县弥上遗址发现了铁块，丹后半岛的扇谷遗址及京都的函石滨遗址发现了铁滓。反映畿内地区冶炼技术水平的金属制品，除了铁器外，还有铜器。尤其是反映当时最高技术水平的铜铎制造业很发达，至今已发现铜铎模具 33 件，占全国同类发现总数的 80.5%。第三，已有尊卑和贫富差别。这从畿内地区的坟墓形式可知，弥生时代畿内的墓葬，大体上经历了土圪墓、壶棺→方形周沟墓→坟丘墓→古坟四个阶段。方形周沟墓的出现是在弥生中期，它与土圪墓并存于一个墓域。大阪府宫前遗址中，发掘土圪墓 100 座，而方形周沟墓仅 20 座。反映了被埋葬者的阶级差异。弥生后期出现了坟丘墓。冈山县仓敷市的楯筑坟丘墓是一座中心为圆形，两侧为方形的双方中圆坟。中心的圆形坟丘直

径为 50 米，坟墓的全长为 80 米。大阪平野的西条 52 号圆丘坟中出土了铁剑、铜镜，并发现墓圻内撒有朱丹，表明是一座有权威、有财富的贵族的坟墓。第四，已有军事组织。在近畿、中国和四国的濑户内海沿岸，发现弥生时代中后期的高地集落，大多建在海拔 30~250 米的丘陵上。这些遗址中不但出土了石、铜、铁武器，而且也发现了生产工具和炭化谷物等，这很可能是一种“屯田型军事性高地集落”。古大和国除了从九州北部间接吸收大陆文化外，还直接输入长江中下游文化和黄河中下游文化。随着国力日强，大和国成为日本列岛上统一的地域国家之一。

从 4 世纪初开始，在各地域性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日本在一定范围内逐渐地实现了国土的统一，即出现了以畿内为核心的大和统一王权。由地域性国家的分散统治，发展为全国性的统一王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种统一不仅是国内发展的需要，也是日本走向国际社会的开始。随着统一国家政权的建立，日本开始形成自己的民族文化。

大和国历代大王都十分重视内政建设。他们认识到国力的增强有赖于生产技术的进步和国家统治组织的先进性。只有拥有文化的先进性和丰厚的国力，才能跻身于东亚国际社会。大和国进行的有关民族文化形成的内政建设，主要有：

#### (1) 招聘和吸收国际人才

人才的来源，一是从朝鲜半岛南部俘获技术工匠。二是朝廷派使者到中国招聘。据《日本书纪》载，大和国朝廷的专使曾到中国江南的吴国和朝鲜半岛上的新罗、百济、高句丽招聘裁缝女工、良医、制皮革工匠等。三是邻国赠送的人才。如百济曾赠送五经博士；中国南朝的宋也曾赠纺织工和裁缝女工，她们名叫汉织、吴织、兄媛、弟媛。四是自动来

日本列岛居住的外来移民。据文献记载，有两次集团性移民特别重要：一是秦氏弓月君集团移民；二是汉氏阿知使主集团移民。这两支移民集团对日本经济、文化的发展影响很大。

### (2) 传入儒教文化，确立大和王朝的统治理念

大和国首先是通过朝鲜半岛的百济传入儒教文化的。百济曾先后派遣阿直歧、王仁、段杨尔、汉高安茂、王柳贵等精通中国典籍的学者到大和国传授学问。儒学的传入，受到了朝廷的重视。历代大和国王都从儒学中吸取有益于治国的思想，以确立治国理念。例如，仁德大王以“君以百姓为本”作为治政理念；雄略大王提出了“令普天下永保安宁”的理念；继体大王则崇尚“所宝惟贤，为善最乐”的信条。

### (3) 引进先进技术 促进经济发展

大和朝廷特别重视引进大陆的先进生产技术。首先重视农业，广泛兴修水利；其次是大力发展手工业。反映手工业水平的遗物，在考古发掘中不断有所发现。其中绢织物已与中国水平接近。再者，兵器中进攻型兵器有刀剑、枪矛、弓矢等，防御型武器有铁制短甲、铁胄和挂甲。铁制兵器技术明显地与中国有渊源关系，很可能是从中国经朝鲜半岛而传入日本的。

592年12月，钦明大王（509—571）之女推古女王（554—628）继位，掌握大和国朝政大权。第二年，推古女王立厩户皇子为皇太子，即圣德太子（574—622），并把朝政大权交给太子掌管。在推古女王和摄政的圣德太子推进下，大和王朝实行了多项改革，史称“推古朝改革”。推古朝改革的主要内容有如下方面：

第一，制定根据个人才能、功绩，确定身份秩序的冠位

制。603年12月制定了《冠位十二阶》，即按儒家的德、仁、礼、信、义、智表示冠位的高低。其核心思想贯串了“德治”思想。604年正月，正式宣布推行冠位制，其授予权由朝廷掌握。

第二，制定了《十七条宪法》。这是日本历史上首次提出的较为完整和具体的建立中央集权统治的政治纲领。它从思想和理论上阐述了君臣关系，并规定了各级官吏的权利与义务。

《十七条宪法》依据儒家的伦理观，即“礼之用，和为贵”的思想，强调了“礼治”。“治民之本，要在乎礼。上不礼而下不齐，下无礼以必有罪，是以君臣有礼，位次不乱；百姓有礼，国家自治。”而实现礼治的要旨，在于“和”。《十七条宪法》特别重视吏治，17条之中有14条涉及各级官吏的行为准则。

第三，重视僧尼纲纪，以及促使神道与佛教矛盾的淡化。佛教传入日本是在552年。作为“蕃教”的佛教，立即引起了与传统的神道信仰的冲撞，引发了一连串的矛盾和斗争。在推古朝以前，朝廷已开始促使两者并存的努力。及至推古朝，“国神”与“蕃教”的并存才得以真正的实现。主要表现就是王室率先在推崇佛教的同时，宣布“今当朕世，祭祀神祇，岂有怠乎”，“群臣共为竭心，宣拜神祇”。与此同时，为了减少推行佛教的阻力，朝廷重视佛教僧尼的纲纪建设，派人到百济学习戒律。624年建立了僧官制，任命高僧担任僧正、僧都、法头等职，管理僧尼。并对全国的寺院、僧尼进行清查登记。经过清查登记的寺院有46处，僧尼1385人，其中僧816人，尼569人。

第四，开始编纂史书。推古王朝期间，在圣德太子和苏

我马子的主持下，“录天皇记及国记、臣连伴造国造百八十部并公民等本纪”。这是以中国正史为范本的史书。

第五，积极推进对隋外交。607年派小野妹子为使赴隋。所呈国书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次年，小野妹子回国时，隋朝派裴世清为使赴大和国。同年9月，大和国又派使来隋，所呈国书称“东天皇敬白西皇帝”。这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使用“天皇”名称。

从4世纪初至8世纪初，是古代日本文化飞跃发展的时代。考古学界把4—7世纪称为古坟时代。美术学界则把6世纪末至8世纪初称为飞鸟文化时代。前者以高大的前方后圆的古坟为象征，后者则以佛教寺院建筑为象征。大和国正处在古坟文化和飞鸟文化的重要阶段。

古坟文化所包含的内容，不仅仅是坟墓的建筑。通过坟墓的构造可以看到大和国时的意识形态、阶级状况和贵族的权威；同时通过大量的遗物，可以看到当时的生产技术和水平。从古坟的前方后圆的外形结构分析，很可能源于古代中国的天地观以及郊祀制度。古坟中发掘出的数百枚三角缘神兽铜镜，与中国铜镜在技术上有着密切的关系。

飞鸟文化的一大特色是与佛教有关艺术兴旺发达。寺院建筑、佛像、绘画、工艺品等有明显的进步。有代表性的寺院有飞鸟寺、四天王寺、法隆寺等；有代表性的佛像有法隆寺金堂的释迦三尊像、救世观音等；有代表性的工艺品有中宫寺的天寿国绣帐等<sup>①</sup>。

从弥生文化到古坟文化期间，日本民族语言——原始日

本节关于弥生文化至古坟文化期间的阐述，多采自王金林《简明日本古代史》《古代日本》《邪马台国与古代中国》《弥生文化与古代中国》等著作，特致谢意。

语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日本主从等级社会结构业已形成；原始神道及风俗习惯等体现民族文化的诸方面均已形成。总之，日本形成了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

从大化革新至德川幕府末期，是日本传统文化发展、成熟阶段。这一阶段又以镰仓幕府成立的 1192 年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在 646 年大化革新到镰仓幕府成立前，已形成的日本传统文化，经历了大化革新前后模仿、移植中国唐朝先进文物制度的“唐风化”热潮，日本传统文化结构亦发生了巨大变化；到平安时代（794—1192）中期，日本庄园制形成，律令体制崩溃，在前一时期移植的唐文化逐渐被改造而日本化，从而形成了国风文化，实现了“国风化”。国风化热潮的出现，标志着日本传统文化经历了一个螺旋式发展过程，具有了更为丰富的内容

从 1192 年镰仓幕府建立至 1868 年明治维新，日本经历了镰仓、室町、江户三个幕府统治时期。在幕府武士政权统治时期，完成了佛教的日本化，出现了主张“神主佛从”的伊势神道教，形成了“士农工商”身份等级制度和武士道，完成了儒学的日本化，使日本传统文化又一次经历了一个螺旋式发展过程，走向高度发展和成熟。

## 中日传统文化的不同特点

我们在阐述日本传统文化特征时，如能与中国进行比较和对照，则会更为清晰和鲜明。那么，中日两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特征有哪些不同呢？

第一，原发先进性和继发后进性

东亚文化发源于中国，中国是东亚传统文化的中心，这恐怕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具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古代文化，对其周围地区和民族的古代文化产生过巨大影响。日本著名学者指出，进入铁器时代的“汉民族同四周的长足发展，其余势力也波及到了我们日本列岛，给日本带来了金属文化和农耕技术”<sup>①</sup>。日本学者大多承认是中国古代文明哺育了日本古代文化，这符合历史事实。因此，可以说在东亚文化区内，中国传统文化为原发性，日本传统文化为继发性，这是区别中日传统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

另外，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中国传统文化远比日本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大约在公元前 3 世纪，中国的铁器传到日本时，日本列岛还处于石器时代。美国著名日本学家赖肖尔说：“东半球的较高文明影响到日本列岛的时间，相对来说，是比较晚的。”“同欧洲、中东、印度次大陆和中国比起来，在这个岛国，农业的出现晚了几千年，青铜和铁的使用晚了几个世纪。”<sup>②</sup>这种中国传统文化先进性和日本传统文化的后进性，也可以说明中国文化的原发性和日本传统文化的继发性。英国著名学者贝尔纳指出：“中国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人类文明和科学的巨大中心之一。”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一书中，在谈到当今世界现存的五种社会时说：“古代中国社会的策源地是在黄河流域，它从这里扩展到长江流域。远东社会的策源地把这两个

[日]家永三郎：《日本文化史》，岩波书店 1982 年第二版，第 17 页。

②[美]赖肖尔：《日本人》，孟胜德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0 年 10 月版，第 42 页

流域都包括在内，然后一方面沿着中国海岸向西南方扩展，另一方面向东北扩展到了朝鲜和日本。”<sup>①</sup>汤因比对古代远东社会的论述，清楚地说明了古代东亚地区历史文化发展的脉络，以及古代中日两大民族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发展方向，从而说明了古代中国与日本文化关系中的源与流的关系。

## 第二，自生创造性与移植模仿性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汉族为中心的中华民族，在东亚这块古老的大陆上，经过长期与大自然作斗争的社会生活中，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独立自主地创造出的具有独特性的传统文化。其中不仅有独特的汉字以及由这些汉字记载下来的、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还有由考古发掘出来的无数历史文物，这些都充分地证明，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在培育东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方面所发挥出来的独自创造性。其中特别是代表中国古代宗法伦理道德纲常及其理论的儒家礼教，不仅统治中国的传统精神文化长达两千多年，而且成为其周围东亚国家传统伦理道德、政治和法律所依据的最高准则。这表明，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与其周围不同种类古代文化进行交流时，显示出其强有力的主导地位 and 不被同化的先进主体性格。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说：“中国和它的西方邻国以及南方邻国之间的交往和反应，要比一向所认为的多得多，尽管如此，中国思想和文化模式的基本格调，却保持着明显的、从未间断的自发性。”

东汉以后，佛教由印度传来，至隋唐达到鼎盛时期，官

<sup>①</sup>[英]汤因比：《历史研究》上册，曹未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6月第2版，第28页。

<sup>②</sup>[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1卷第2分册，科学出版社，1975年中文版，第337页。

方提倡儒、佛、道并重，实际上仍以儒教为首，外来的佛教，最终被融合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并成为儒家礼教的附庸。三教之中的道教本来就是中国固有的、自己创造的一种宗教文化。这些均可说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显著的自生创造性特征。

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自生创造性相比较，日本传统文化的自生创造性，则显得非常软弱无力，相反，日本传统文化的移植模仿性特征则极为突出。日本固有文化，主要是原始社会传下来的神道这种较原始的宗教。到公元6世纪，中国的道教传入日本后，与神道融合，丰富和充实了神道内容，成为日本的民族宗教。除了神道以外，作为日本传统文化中很多重要内容，大都是从外国输入的。大约在公元1世纪，中国的汉字输入日本后，日本人一边学着使用汉字，一边借用汉字逐渐创造了日文的假名。今天日本使用的文字就是从中国移植过去的。

关于中国的儒学，大约是3世纪后期，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儒学在日本的广泛传播，不但成为日本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近代社会中，仍然占有非常特殊的地位。除儒学外，佛教大约也在同一时期传入日本，而且很快普及于日本列岛，也同儒学一样成为日本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保存下来了。16世纪中叶又从西方传入了基督教。这种西方文化对日本原有的东亚文化造成巨大冲击。因其传播极大地危害了东方封建专制主义，后来被官方严厉禁止，保持了东亚文化的传统模式。然而，对于日本来说，这种传统模式的主要内容并非日本人创造的，移植模仿则成为日本传统文化的一大特征。

这里还应注意的，造成日本传统文化具有这种移植